



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

——以“书藏”为线索

□刘驰*

摘要 明清以来,在曹学佺、顾炎武、朱筠、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藏书理念开始由官私藏书转向公共藏书。嘉庆年间,阮元在公共藏书理念的影响下,于灵隐、焦山创建了两座初具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藏,预示着官私藏书走向公共藏书的实践转向。此后,书藏逐渐从江南地区的寺院扩展到书院,又被方浚颐、梁鼎芬等从江南引入广东,完成了由北向南的地域扩散。直至20世纪末,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将“开大书藏”作为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以募捐办书藏、以书藏兴学会、以学会促改革的变革步骤,使得书藏一时风靡全国、得以与西方文化相交会,并促成了中国近代新式藏书思想的诞生。可见,书藏制度与文化一直引领着清代以来藏书史内在变革的潮流。以“书藏”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 书藏 中国藏书史 近代转向 内在理路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1.020

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人才是否兴盛、文化是否发达,都与藏书密切相关,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甚至将藏书状况视为一国文明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对藏书史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国或一代文明的发展状况。而中国又素为文献之邦,历来重视藏书,官方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事业都非常兴旺,至清代而臻于鼎盛。直到戊戌变法前后,传统藏书渐趋式微,新式图书馆纷纷兴起,中国藏书史开始迅速地进入近代化阶段。这一转向固然是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应激反应,但中国藏书制度与文化的困境是否是从遭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后才开始产生的?近代化的藏书制度与文化是否只是对西方的仿效,抑或是在古代中国早已萌芽,而在近代得以与西方文明相结合?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研究中国藏书史的发展与演变至关重要,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前贤在晚清藏书史领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较为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藏书史转变的内在理路关注较少,对书藏在其中所发挥的历史

作用尚不够重视。如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2]、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3]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图书馆所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剖析较为深刻。吴晞更是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全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中国传统藏书毫无关系:“从本质上看,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1](2-3)] 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传统藏书制度与文化中所蕴含的变革因素。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4]对晚清图书馆思想的发展、演变有十分全面、深刻的研究,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5]对清代藏书史转变与传统藏书思想、制度之间的关系颇有揭示,二者对书藏也各有精彩叙述,但受体例所限,都未对书藏进行更加集中的研究,以揭示其跨时段、跨地域的演变与传播过程,以及其在中国藏书史内在转向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6]。

事实上,以清代书藏为线索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为晚清藏书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结论。从

* 刘驰, ORCID: 0000-0002-0356-9580, 邮箱: liuchi@nju.edu.cn。



曹溶号召流通古书、周永年倡议创设儒藏,到阮元在灵隐、焦山建立书藏,到书藏从江南地区的寺院扩展到书院,到方浚颐、梁鼎芬等将书藏引入广东,再到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将“开大书藏”作为近代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书藏制度与文化一直引领着中国藏书史内在变革的潮流,最终得以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相交会,共同促成了中国新式藏书思想的诞生。因此,以书藏为线索进行研究,有助于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①。

1 由官私藏书走向公共藏书:清代藏书的理念转向

明清时期,传统藏书事业在趋于鼎盛的同时,其困境也逐渐暴露。此时,藏书主体仍以官藏、私藏为主,缺乏公共藏书。官私藏书一方面面临着流传危机,随着朝代更迭、家族兴衰,藏书极易散失,著述之书遂无法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全并流传;另一方面还面临着流通困难,官方藏书往往深处皇宫内苑,私人藏书家也多秘笈自珍,这就导致书籍这一宝贵资源为官私藏书所垄断,不易在社会上流通,更难转化为士林甚至民间的公共资源。可见,官私藏书既不能保证书籍的纵向流传,更无法促进书籍的横向流通,无论是就“收藏”功能而言,还是就“实用”功能而论,都有所欠缺,更遑论二者兼顾。正因如此,部分士人开始对传统藏书方式提出各种质疑,并设计出不同的补救与改良方案,这就直接推动了中国藏书理念的转向。

对于传统藏书的困境,明清人早有认识,如曹溶云:“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7]道出了当时藏书弊病的根本所在,即过分注重收藏,而不实用。周永年也说:“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②指出了书籍难以在地域间流通和难以历时性流传的弊病。要之,其症结都在于官藏与私藏之外公共藏书的缺乏。

有鉴于此,不少有志之士开始提出藏书的变通之道,儒藏思想堪称代表。关于儒藏思想的发展脉络,王蕾《论儒藏思想的发展》一文有专门研究^[8],兹不赘述。值得补充的是,顾炎武、朱筠两位大学者,也曾提出在官私藏书之外另建公共藏书处所的举措。据《春冰室野乘》记载,旧槧《音学五书》前有徐乾学兄弟三人的启文,其中提及顾炎武晚年欲建立书藏的构想:

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藏于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书籍藏其中,以诏后之学者。先达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堂中,或借录副,庶传习有资,坟典不坠。^[9]

又记载朱筠“尝议建书藏于曲阜孔氏,广度古今坟籍”^[9]。可惜事皆不果。

周永年的《儒藏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说。他吸收了前人思想,在借鉴佛、道藏书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全新的藏书体系,既区别于官藏,又区别于私藏,其构想已经具备了公共藏书的雏形,并具有社会改良的色彩。章学诚就曾高度评价他的藏书理念:

近世著录,若天一阁、莱竹堂、传是楼、述古堂诸家……或以炫博,或以稽数,其指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计于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其智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10]

在章学诚眼中,周永年的藏书理念迥拔流俗,不同于一般藏书家,其用心在公,有助于将书籍留存于永久、推广于天下,以便匡正学术、养成风俗。

前人虽然对周永年的学说多有引用,并予以高度评价^③,但较少从中国藏书史转向的角度对其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此处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论述,以揭示中国藏书理念出现的重要新变:

其一,就性质而言,由官藏、私藏转向公藏。传统官私藏书大都不向社会大众开放,内阁珍本虽多,私家藏书虽众,却无法将其所藏书籍变为天下的公共学术资源,因此周永年主张由官府或士族号召民众,择名胜之地共建书藏,以实现资源共享:

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

① 不少学者都对“内在理路”说有所阐发,其要旨在于避开简单的“刺激—反应”论,深入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由古代转向近代的内在原因。本文也试图从内在原因着手,梳理出一条中国藏书史朝近代转向的发展脉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不否定外在因素的重要作用,更无意作出是非彼彼、谁主谁次式的判断,而是主张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细微、深入的梳理与还原,以使历史变得更加“血肉丰满”。

② 本文《儒藏说》文字皆引自:周永年,《儒藏说》[G]//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47—50。

③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对儒藏思想及其影响分析较为全面,可供参考。



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

杨念群就曾指出其设想与曹溶之不同:“周永年提出‘儒藏说’还有一个深层意图,那就是试图把原属于私人领域中的典籍收藏,通过加速流通的方式转变成一种学林共享的公共资源,这样一个基于网络控制的理念与曹溶所言典籍交换仅限于个别私人之间的盟约关系大有差异。”^[11]进一步言之,通过这样一种共建共享的方式,书藏就建立起了一套区别于官私藏书的公共藏书系统,可以将典籍转变为公共资源,以实现天下人共藏之、天下人共享之的理想。

其二,就功用而言,由收藏转向实用。传统官私藏书都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周永年的构想更偏重实用:

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稟苟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寒士,往往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

他认为乡野之人纵然天资出群,学问却难以广大,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书籍,因此他主张在这些地方设立书藏以培养人才,将藏书的主要功用由收藏转向实用,这就使得其理论具有了社会改良的意义,后来梁启超等人以“开大书藏”改良社会的构想正与之一脉相承。

其三,就收藏对象而言,扩大了收藏对象,由经史辞章之学转向百家专门之学。在清朝,经史辞章之学盛行,帝王以之为统御之术,士人以之为晋身之阶,因此清人藏书往往以经史辞章之学为主,旁及金石、书画等领域,范围较为狭隘。周永年则主张藏书应注重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等百家专门之学:

郑渔仲曰:“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以其未尽见古人之书,故拘于习尚以自足耳。果取古人之书,条分眉列,天文地理、水利农田,任人所求而咸在。苟有千古自命之志,孰肯舍其实

者,取其虚者乎?故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

“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等学问素为一般士大夫所不屑,私人藏书家对此类书籍更是嗤之以鼻,周永年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专门之书与专门之学的重要,号召通过收藏专门之书以培养专门之学,这与诺代、莱布尼兹等西方先贤的理论提倡不谋而合,也预示了近代以后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新变。

其四,在管理制度方面,为公共藏书奠定了初步的管理制度,且非常注重为读者服务。公共藏书与官方、私人藏书不同,它是由地方社会共建而来,其资源又须与社会共享,因此就必须有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周永年对此进行了初步设计:

书籍收藏之宜,及每岁田租所入,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须略立规条,如丛林故事。极寒者并量给束脩,免其内顾之忧。有餘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

可见他对经费来源、管理人员配置、读者饮食等问题都有考虑。

要之,明清时期官私藏书在趋于鼎盛的同时,书籍作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逐渐被官方和少数藏书家所垄断,成为他们炫博斗奇的收藏品,而无法达到物尽其用的实用目的。为了弥补官藏与私藏的弊端,使藏书由封闭走向开放,更好地发挥其实用功能,以加强书籍流通,助益人才培养,周永年提出《儒藏说》,构建起一套区别于官私藏书的公共藏书理论。《儒藏说》不但揭露出传统官私藏书的弊病,预示了中国藏书史转变的方向,并且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改良色彩,足以与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前后辉映。

2 灵隐、焦山书藏:清代藏书的实践转向

从曹溶到周永年,中国的藏书理论开始发生新变。四库七阁与灵隐、焦山书藏的设立都是对这一理论新变的回应,体现出清代藏书在实践层面的重要转向。由于四库七阁是清代全盛时期皇权运作下的产物,无论是民间还是后世皇帝都难以复制,且古今学者对其论述已多^①,故本文从略,只以灵隐、焦

^①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对儒藏思想与四库七阁的关系已有详细考辨,故本文从略。



山书藏为核心进行讨论。前辈学者对灵隐、焦山书藏也十分重视,但主要是将其置于寺庙藏书的视域中进行观照,忽略了它们已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某些特征^①。灵隐、焦山书藏在地址选择、创办模式、管理制度、服务功能、收藏对象等方面极具特色,已与传统寺庙藏书截然不同,更是直接启发了丰湖书藏、梁祠图书馆的建立,对广东地区藏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化藏书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因此,有必要将灵隐、焦山书藏置于中国藏书史演变的宏观视野中深入考察。

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先后在灵隐、焦山设立书藏。直接触发他选择在寺庙创建书藏的机缘是翁方纲的一封信。当时,翁方纲寄函紫阳书院山长石蕴玉云:“《复初斋集》刻成,为我置一部于灵隐”^[12],阮元对此举颇为赞赏,再联想到司马迁藏史名山、白居易藏诗寺庙等案例,便决定将寺院作为设立书藏的最佳选址。

在设立书藏的过程中,阮元明显受到了曹学佺等人藏书理论的影响,《杭州灵隐书藏记》对“书藏”一词进行考释时便提到曹学佺的儒藏思想。阮元在《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中颂扬了张金吾通过刊刻藏书促进典籍流通的行为,认为“诒经堂、诗史阁、求旧书庄诸地,皆罗列古今人使后人共见之地”,并据此提出“以书公之天下后世”的思想^[13]。若借用“以书公之天下后世”一语概括其创建书藏的初衷,也颇为恰当。他是想解决书籍在流传、流通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这就与一般官私藏书的目的迥然不同,而同曹溶、周永年的理念较为接近。

书藏设立后,阮元为其制定了较为完备、可操作的管理条例。灵隐、焦山二藏的管理条例基本相同,只有书橱编号不同,灵隐书藏编号取的是宋之问《灵隐寺》诗中之字,焦山书藏编号取的则是《瘞鹤铭》铭中之文,体现出了因地制宜的编号特色。

灵隐、焦山书藏的设立及其管理条例的制定,体现出中国古代藏书史在实践层面的几个重要转向,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一,就地址选择而论,以社会公共场所寺庙作为藏书之地,既便于典籍的保存,又便于典籍的流通。

藏书地址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凭空建造全新的公共藏书,则花费巨大,事不易成,因此阮元选择

了较为简便易行的方式,在既有的社会公共场所寺庙内建立书藏。之所以作此抉择,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寺庙多处名山胜迹之中,法统代代相传,相比于官私藏书场所,受世俗变迁影响更小^②;二是寺庙多设有佛藏,藏书历史悠久、管理制度规范,且便于向世俗募捐;三是寺庙为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具有公共属性,文化氛围开放,便于文人往来访书,以促进书籍流通,灵隐寺为杭州重要文化场所,自不待言,焦山扼运河之要冲,亦是文化交流的胜地,“名公巨卿、富商大贾、山人墨客、村夫俗子罔不可跻其巅”^[14];四是灵隐、焦山文化氛围浓厚,寺内僧人多识文字,甚或工于诗、书、画,如焦山定慧寺主持借庵便是名重一时的诗僧,既善于管理书藏、又巧于待人接物,寺内还藏有周无专鼎、西汉定陶鼎、瘞鹤铭等文物,更有天下闻名的焦山碑林,皆可与书藏交相辉映^③。总之,在寺庙内设立书藏,既便于典籍的保存,又便于典籍的流通。

其二,就创办模式而论,官私共建,采用了官方筹办、私人捐赠的模式。

其他藏书或官、或私,极少采用官私共建的模式,如曹溶、周永年等人曾提倡书籍募捐、征集制度,可惜缺乏官方力量的支持,未能大范围实施;乾隆皇帝虽曾下诏向民间征书以编纂《四库全书》,却是以皇权为威慑的官方强制行为,“南三阁”仍属于官方藏书机构,缺乏私人的参与。灵隐、焦山书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体现出官私共建的特色:它们分别是阮元以浙江巡抚、漕运总督的身份筹办的,管理经费均来自盐运司,这是其“官”的一面;其藏书主要来自私人的自愿捐赠,这是其“私”的一面。

尤其是募捐、征集方式的使用,极大地调动了私人参与的积极性。为了获得更多书籍,灵隐、焦山书

① 如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典藏卷》第二章《典藏单位》第四节《寺观藏书》,济南:齐鲁书社,1998:158—160;《中国藏书通史》第六章《清代书院藏书和寺观繁荣》:1006—1008。

② 如阮元《灵隐置书藏纪事》云:“近代多书楼,难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与俗隔崖岸。岩峽灵隐峰,琳宫敞楼观。共为藏书来,藏室特修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29。

③ 正如阮元《与王柳村处士豫、丁柏川观察淮、方静也茂才士倏、焦山僧借庵同立焦山书藏,诗以纪事》云:“周汉二鼎间,常有海云覆。鹤铭残字多,编列签厨富。万卷压江涛,千函寄烟岫。付与诗僧收,何异长恩守。况是仁者静,山寿书亦寿。千载传其人,更有史迁副。”《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548。



藏注重征集当世著述,这就极大地符合了时人想让作品传之后世的需求,因此四方文人都纷纷捐书。潘衍桐《题阮中丞所作灵隐书藏》一诗记录下了捐书的情形:

龙宫藏经处,楼阁高嵯峨。中丞改书藏,指挥成刹那。欲使山灵守,永保著述科。大庇寒士心,倍胜广厦多。络绎捆载至,绡帙填层阿。却似梵贝叶,白马西域驮……庶积石室卷,千劫经不磨。住持戒扁鐏,擅出严搗诃。事同香山老,送集投祇陀。宝函缄象轴,锦签织凤梭。兹焉华严海,文字流江河。暇日曝书会,宾从盛玉珂……^[15]

众人为灵隐书藏捐书并举行曝书会的盛况从此诗中尚可窥见一二。阮元自己率先捐宋元方志 2 册,并图书 206 种 1400 余册。陈文述曾多次向灵隐、焦山捐书,并创作了《以诗集寄灵隐书藏,赋呈琅嬛主人并柬寺僧玉峰》《灵隐藏书思著述也,琅嬛中丞设书藏于灵隐,因以所著藏焉》《以所著书付焦山书藏赠借庵》等诗以记其事^①。光绪十七年,梁鼎芬见焦山书藏未曾毁于战火,大喜过望,直接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藏书都捐给焦山书藏^②,并号召四方捐书,丁丙应其倡导,共捐书一千册^③。其余捐书者更是不计其数。据传焦山书藏书籍最多时有 3570 种 4002 部 59747 卷 21470 册;据 1934 年编成的《焦山书藏书目》及《焦山书藏书目补遗》统计,焦山书藏共收藏经、史、子、集、志、丛六部书籍约 1831 种 2048 部 34467 卷半 12132 册^④。

募捐、征集的方式不仅让书藏获得了丰富的书籍,还使其名声迅速传播开来。灵隐、焦山书藏有助于书籍的保存与流传,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如叶廷琯《鸥波渔话》记载有人在燕市书摊见到和珅的《嘉乐堂集》,觉得此集颇为罕见,于是“亟买一帙,寄焦山书藏贮之”^[16];汪喜孙曾建议王氏父子将《经义述闻》藏于焦山,以期流传万世:“若刷印甘本,一付陈石甫交与吴门书市,与日本书舫易《群经治要》诸书;一付琉璃厂书坊,听其易高丽书史;一上之阮督部,藏之匡庐、西湖、焦山三书藏……此千万世之长策也。”^[17]

其三,就管理制度而论,委托官私之外的第三方寺庙僧人进行管理,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与条例。

阮元没有将书藏的管理任务交给官方或私人,

而是委托给了作为第三方的寺庙僧人,这就使得管理方(僧人)、出资方(官方)、捐赠方(私人)相互独立,既便于官府和文人群体对僧人进行监督,也杜绝了书藏被官私两方据为己有、拒绝开放的隐患。

阮元还亲自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与条例,供看守书藏的僧人执行。在选址、建筑、编号方面:焦山书藏选址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有楼三楹、贮书厨十八^[18],以《瘞鹤铭》文字进行编号。在人事方面:选用两名识字知文的僧人担任看守职位,由盐运司每月发放香灯银十两。在收藏方面: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每本书都需钤印、编入目录;每本书还需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检^[19]。

其四,就服务功能而论,社会共享,发挥了藏书服务大众、促进学术的功能。

灵隐、焦山书藏面对天下之人开放,不同于一般官私藏书封闭的特点,可促进书籍与知识的流通,发挥藏书服务大众、促进学术的功能,如潘衍桐就认为书藏可以“大庇寒士心”,李富孙甚至说:“或有怀饼客,亦许来掣究”^[20],语似夸张,却是灵隐、焦山书藏开放、实用性质的极佳写照。

灵隐、焦山书藏设置后不久,太平军便由南而北起义,战火所及,灵隐书藏化为焦土,焦山书藏也险遭浩劫。即便如此,它们也发挥出了服务大众、促进学术的功用。不少名人都曾在这两处书藏观书,如陈衍本不知孙诒让能诗,直到在灵隐书藏发现其诗集后才将其诗作选入《石遗室诗话》:“向只知孙仲容为考据之学,缄札往来,未询其为诗也。偶至灵隐寺书藏,见书目上有孙仲容诗一册。记其《吉日癸巳石

① 分别见于陈文述《颐道堂集“诗选”卷九、十二、二十[M].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② “君(梁鼎芬)藏书数百簏。三分之一,一赠焦山寺,一存广州梁祠,一留自读,今保存者惟焦山寺书耳。”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28—29。

③ “今年粤东梁星海太史来杭,言客岁游焦山,见书藏未毁,瑶函秘笈,如在桃花源,不遭秦火,山僧尚守成规,簿录管钥,虽历七八十年,流传弗替,可谓难矣。藏中尚空四厨,太史遍告同侪,将募书以实之,增助山中故事。太史亦有心人哉!因检嘉惠堂所藏、所刊、所写诸书,又从朋好乞得家集,凡四百五十一部,计二千六百有八卷,综一千册,缮目弃置其中,敬乞山灵,如前呵护。”丁立中:《宜堂类编[M].卷二十年谱第三,光绪二十六年丁氏嘉惠堂刊本:28B—29A。

④ 焦山书藏委员会.焦山书藏书目[G]//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537—540。其中,《焦山书藏书目》著录书籍约1824种2041部34447卷半12122册,《焦山书藏书目补遗》著录书籍约7种7部20卷10册。



刻》二首。”^[21]王豫《淮海英灵续集》记载了诗人黄金想要投靠阮元，却被王小村留在焦山书藏观书之事^[22]；潘衍桐在写《缉雅堂诗话》时曾至焦山书藏观书，范锴的《吴兴藏书录》《蜀产吟》《感逝吟》《续汉上题襟集》《苕溪渔隐诗稿》《苕溪渔隐词稿》《幽华诗略》等书均是从焦山书藏获见^[23]；陈任昉编纂《京口三山志》时曾到焦山书藏查阅资料，在此期间还据山僧提供的诗稿编纂了《焦山六上人诗》^[24]；缪荃孙曾多次在焦山书藏观书，如1889年11月20日“南皮师约同游焦山……取抱芳阁《俄游汇编》五部”、1894年6月14日“游焦山，观杨忠愍公墨迹手卷”、10月30日“观书藏及五文石”^①；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来到焦山书藏读书、养性近一年，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5]；1929年，《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为了“徵文献掌故于本山（按：即焦山）之书藏藏书”，在焦山松寥阁开设志局，后发现焦山藏书丰富，又单独成立了焦山书藏委员会以整理书藏藏书并为之编目^[18]，在焦山书藏委员会担任委员的柳亚子、陈去病、柳诒徵、庄蕴宽、金弼等人多为一时名流^[26]。

其五，就收藏对象而论，广罗群籍，古今并蓄，中外兼收。

收藏方面古今并蓄，不独尚古籍善本，如刘彬华云：“或述或作刻或写，人今人古俱无论。但使此藏如大海，江淮河济相追奔。又使此藏如大贾，明珠大贝高昆仑。岂无川与潦，大海不言尊。岂无杂与碎，大贾不言纷”^[27]。从《焦山书藏书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藏书均为时人著述。书藏内甚至收藏了一些西学书籍，体现出中西兼收的特点，如史部地理类：陈兰彬《使美纪略》，缪祐孙《俄游汇编》，冯焄光《西行日记》，张星娘译《马哥孛罗游记》，蒋友仁译《地理图说》，张士瀛刊《地球韵言》，日本雪海指南社编、江楚编译局译《小学万国地理教课书》，刘邦骥《中学地理外国志》，杜宗玉《西学地理通释》；外国史专著亦有不少，《焦山书藏书目》单独辟有“外国史类”，收录有《日本史纲》，日本青木武助编、中国张相译《日本历史》，美国彼德巴利编、中国陈寿彭译《万国史略》，刘鑑译《埃及近事考》，陈寿彭译《外国烈女传》；政书类收有杨楷《通商列表》、许景澄《德国陆军纪略》、何元翰译述《英国警察》（附《各国警察大纲分类巡捕新编》）^[28]。缪荃孙就曾在焦山借阅《俄游汇编》；马一浮也曾在焦山书藏读书，期间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文

学名著《唐吉珂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

综上所述，灵隐、焦山书藏堪称清代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在当时享有盛誉，体现出了清代藏书在实践层面的转向。二者既是对曹学佺、曹溶、周永年等人理论的回应，又成为了梁鼎芬、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新式藏书理论的思想源泉和可征引的先例，对近代藏书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3 从江南到广东：书藏的地域扩散

灵隐、焦山书藏成立之后，声名大噪，陈文述甚至将其与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并举：“两书藏与海内七阁并峙，儒林文苑仰若日星”^[29]。更为重要的是这二者尤其是焦山书藏的成功，对后世的藏书制度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奠定了广东地区基本的藏书方式。

阮氏二藏的建立首先影响了江南地区的藏书方式，书藏设立的场所开始由寺庙扩展到书院。后世不少书院藏书都仿效其法，著名者如安亭书藏与中江书院尊经阁。

道光七年（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奉皇命建成震川书院，书院中还营造有藏书阁，本拟题名为“藏经阁”。阮元的弟子陈文述听说此事后便建议仿照灵隐、焦山书藏设立“安亭书藏”：“余谓士子应读之书非止经也，亦有列代之史、诸子之书、百家之集焉，且颜以藏经，恐近于佛家之说，不若以书藏名之，则与灵隐、焦山辉映东南矣。”并对书藏的收藏范围和室内布局进行了规划，提出了将古今书籍分馆而藏的思想：“惟灵隐、焦山两书藏专藏近代人著录，书院则以经、史、子、集为重，宜分度两楹，左陈古编、右弃今籍，俾过斯地者一登楼而如入琅环谲觚之福地。”他还将自家藏书中重复者及家刻十三种捐赠给书藏^[29]。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安徽江中书院尊经阁建成，在阁上仿效灵隐、焦山书藏建立了书库，并对阮元募捐、征集制度进行了继承：“阁之上，仿仪征阮公焦山书藏、灵隐寺书藏例，上为书库，募捐官、私刻集以实之。”^[30]

受书藏影响最大的还属广东地区。阮元曾在广

① 分别见于《缪荃孙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的《艺风老人日记》，第一册第97、314页，第二册第47页。



东任官,建立了著名的学海堂,对广东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蒋益澧、方浚颐建立的“菊坡精舍书藏”,梁鼎芬建立的丰湖书藏,均是仿照灵隐、焦山二藏而设,这就使得书藏的影响由江南扩散到广东,对广东地区藏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巡抚蒋益澧与布政司方浚颐商议将越秀山废弃道观改为书院,取名为“菊坡精舍”,并在精舍中设立书藏,名之为“菊坡精舍书藏”。“菊坡精舍书藏”的成立绝非偶然。首先,菊坡精舍邻近阮元兴办的学海堂,而焦山、灵隐书藏的创设者也正是阮元,菊坡精舍书藏的直接规划者陈澧就曾主讲学海堂数十年,受阮元影响颇深;其次,方浚颐时常往来焦山,与焦山诗僧交往非常密切,对焦山书藏应是了如指掌^①。或许正是因为以上两层原因,菊坡精舍才会仿照焦山书藏建立书藏。谭宗浚《菊坡精舍书藏铭》一文开篇便指出了菊坡精舍书藏与焦山、灵隐书藏之间的渊源:“菊坡精舍书藏何为作也?盖仿焦山寺、灵隐寺书藏而作也”^[31]。徐绍桢在《广东藏书纪事诗》中也记载了灵隐、焦山书藏对菊坡精舍书藏的影响:“吟风阁下讲筵开,通德门前问字来。灵隐、焦山相媲美,绿阴青子护崔台”^[32],并记载了书藏的经费来自盐运使钟谦钧,他还认为:“菊坡精舍培植人树,足继学海堂”。可以说,正是“菊坡精舍书藏”将阮元书藏的影响力由江南扩散到广东。

光绪三年(1877年),梁鼎芬到菊坡精舍问学,投入陈澧门下,并在此度过了几年宝贵的读书时光。期间,他自然免不了要前往菊坡精舍书藏阅书。受菊坡精舍书藏的影响,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在丰湖书院也仿照焦山、灵隐书藏建立了丰湖书藏,并制定《丰湖书藏四约》,从理论、实践的层面对阮元的书藏思想进行了完善:

其一,继承发扬了募捐、征集制。广东地区文化兴盛较晚,官私藏书数量尚无法与江南地区相比,梁鼎芬欲建立书藏却担心无法广备书籍,于是仿效阮元的募捐与征集制,发布了《捐书启事》,并在张之洞的支持下“走简名流,投书贤吏”,共募得各类图书46000余册。丰湖书藏的藏书数量最多时更是达到了10万册,在当时广东各大书院中首屈一指。

其二,更加重视书藏的开放与实用,性质与功能进一步趋近于公共图书馆。梁鼎芬在《丰湖书藏四约》开篇就说:“有书而不借,谓之鄙吝;借书而不还,

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之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与藏书家不同)。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既久,沾溉斯多”^[33],他还多次强调“以与天下百姓共读之”的思想,可见他是将书藏的性质定位为公共文化场所;将书藏的功能定位为传播知识与培养人才,规定其宗旨是“饷寒士”,并号召“人人保护、人人发愤”。这与阮元“书公之天下后世”的理念一脉相承,后来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捐书启》也继承了此思想。

其三,提出了为读者编纂目录的思想,从理论上改变了目录的主要功用。梁鼎芬手编《丰湖藏书目》8卷,其目的主要在于“供诸生查览”,虽然其编目方式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却已经提出为读者编纂目录的思想。

其四,建立了详细、完善的管理制度——《丰湖书藏四约》。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右,梁鼎芬制定了《丰湖书藏四约》,在书藏内实行,效果甚佳。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州的学生想要效仿其法,于是又请梁鼎芬重新刊刻了条例。《丰湖书藏四约》共分为“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条,每一条又事无巨细地列有若干具体条例,可以视为对阮元的书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传统藏书条例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丰湖书藏的藏书量一度多达10万余册,名动广东。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鼎芬在焦山隐居时,曾为焦山整理并征集书籍,他还不无得意地将丰湖书藏与焦山书藏进行对比:“焦山书藏今始见,千卷签函余再题。他日丰湖倘相较,有人访古过桥西”^[34]。

菊坡精舍书藏、丰湖书藏等书藏的成功,使得书藏成为广东最为重要的藏书形式之一,《〈广东通志总目〉说明书》就专门列有“书藏”一条,并解释说:“凡公私藏书之所如图书馆藏书楼等,皆当记载。所以不称图书馆而称书藏者,以书藏为本省旧有名称,如端江书藏,丰湖书藏。”^[35]粤地文人已经将“书藏”视为本省旧有名称,足见书藏对于广东藏书影响的深远。

1911年,梁鼎芬将自家藏书楼改名为“梁祠图

① 方浚颐在赴广东任官之前,已与焦山诗僧熟识,曾在《二知轩诗钞》《二知轩诗续钞》《二知轩文存》等著作中屡次提及他与焦山诗僧之间的频繁交往。



书馆”，建成了广东地区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私立公共图书馆，并为之制定了《梁祠图书馆章程》。此时已是近代新式图书馆纷纷兴起之际，梁氏的私家图书楼也开始转变为近代化的公共图书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图书馆受书藏影响极大，《梁祠图书馆章程》也是在继承《丰湖书藏四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原本的“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变成了“观书约”“钞书约”“借书约”“读书约”“捐书约”，读者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成为了图书馆章程的主要关注对象^[36]。

丰湖书藏是传统藏书楼，梁祠图书馆是广东第一座以“图书馆”命名的近代化新式图书馆，二者看似一旧一新，却均为梁鼎芬所设，在制度层面也颇有渊源关系。从丰湖书藏到梁氏图书馆的制度演变历程中，就可以窥见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绝非一蹴而就，也绝非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具备着深刻的内在演变逻辑。

4 书藏与近代改良运动的发生及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

从菊坡精舍书藏、丰湖书藏等广东书藏的建立可以看出书藏已经由江南扩散到广东，而且其性质更加开放，其制度也更加完备，堪称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藏书形式之一。但此时书藏的重要性尚未被国人普遍认识，其影响力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广东地区。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改良社会、振兴中国的方案，在此过程中，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认为公共藏书的缺失是民智不开的重要原因，他们在接受西方先进藏书文化的同时对书藏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借鉴其成功经验，提出了新式藏书思想，以图培养人才、改良政治，这就使得“开大书藏”成为了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促进了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

1895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各省举子联名上书，请求变法。他于《上清帝第二书》中系统阐述了变法纲要，在论及强国之道时，提出了“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论断，认为英、美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才智之民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这又与“其属郡县，各有书藏”的现象密不可分；反观中国，由于书藏少，故而才智之士缺乏：“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士人

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因此，康氏建议在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内都应设立书藏，下至乡镇也不例外：“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37]

光绪皇帝此时也锐志改革，发布上谕强调“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受康有为的影响，李端棻于1896年上了一道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在奏折中，李端棻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改革措施，“一经”是开设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便是因此而成立；“五纬”的第一项即是“设藏书楼”，而在设藏书楼的建议中，他特别指出了焦山、灵隐书藏对于江浙文风的影响，可见李氏的思想显然受到了焦山、灵隐书藏的启发。在奏折中，他先强调了好学之士贫困的处境：

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固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38]。

然后回顾历史，指出江南文化兴盛的原因就在于南三阁与焦山、灵隐书藏的影响：

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度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38]

可见，他也如陈文述等人一样，将焦山、灵隐书藏视为堪与“七阁”并称的藏书楼。在吸收焦山、灵隐书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又以西方为参考，提出了“设藏书楼”的改革主张：

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38]

在这道奏折中，藏书楼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了，它不再只是国家稽古右文、润色鸿业的举措，也不再只是文人炫博逞奇、资学助才的方式，而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大清帝国兴衰的第一等要事，藏书开始成为近代社会改良的核心内容之一。若非如此，中国藏书事业的近代化过程恐怕不会进行得如此迅速。显而易见的是，焦山、灵隐书藏一定程度上为这道奏折的书写者李端棻提供了变革的思路和论说的佐证。

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在康、李二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书藏的重要性。康有为曾建立万木草堂书藏，试图以书藏



振兴学会,以学会促进改革,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继承、发扬了康有为的思想,在号召社会各界向万木草堂书藏捐书的同时,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书藏思想的来源及其对变法的重要性。与康有为一样,梁启超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为“支那学人少”,进而又将“支那学人少”的原因归为书籍之难得,从而突出了藏书楼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佐证其观点,他还列举了西方和中国的事例进行论述。在论述西方时,他以英国为例,将其国力强盛的原因总结为“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书楼”;在论述中国时,则以乾嘉时期为例,将其学术繁荣的缘由归功为“七阁”与焦山、灵隐书藏:

昔高宗既勒成《四库全书》,著录天府,复于江浙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以饷江左之学者。而仪征阮相国亦体右文之盛德,设焦山、灵隐各书藏。故乾嘉之间,江左之学者,人蒲竹而家铅槧,学术之茂,近古所希,斯藏书之明效哉^[39]。

这就与《请推广学校折》的观点一致,将焦山、灵隐书藏视为足以与“七阁”媲美的清代藏书楼的典范。从中就可看出,焦山、灵隐书藏对康、梁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和万木草堂书藏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焦山、灵隐书藏在清代藏书史上与众不同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将二者与南三阁并举,显然不是就规模、大小而论,而是认为焦山、灵隐书藏具备了公共藏书的性质,其经验有助于促进近代化藏书思想的形成与推广,以推动政治改良。梁启超还在文章中论述了“开大书藏”这一举措对于改良运动的意义所在:

数年以来,同志借读渐多,集书亦渐增,稍稍及万卷,而粤士之忧天下者,方将联一学会,群萃州处,以相切磋,以讲求救天下之学。启超以为书之不备,不足以言学,图器之不备,不足以言学。欲兴学会,必自藏图书器始,于是思因向者书藏之旧而扩充焉……盛意提倡,慨赠百城;阐扬风流,沾溉末学。他日五岭之间,南海之滨,其或有一二倜傥非常之士,得以肆力于学,养成其才,以备国家缓急乎,皆仁人君子之赐也。^[39]

这种依靠募捐、征集开大书藏的方式正是仿效阮元而来;以书藏为基础兴办学会的思想,则可能受

到了梁鼎芬等人以书藏振兴书院思想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继承、发扬了前贤欲以书藏改良社会的理念,并踵事增华,将募捐图书、建设书藏视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关键步骤,认为唯有大备书籍才能成立书藏,唯有成立书藏才能进一步兴办学会,唯有兴办学会才能更好地进行政治改革。

通观康、梁改革之路,这套以募捐办书藏、以书藏兴学会、以学会促改革的思路,始终为二人所贯彻、实践。除了万木草堂书藏之外,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还曾筹划在北京琉璃厂建立书藏,以作为开办学会的基础,可惜被朝臣弹劾,事业未成。此后,两人又到上海兴办强学会及书藏,并在《强学报》上极力宣扬“开大书藏”的思想,如《上海强学会章程》就将“开大书藏”列为“最要者四事”之一。1898年,南学会正式成立,并仿效此前学会中的书藏制度,建藏书处,士绅为之捐书者甚众,仅《湘报》所公布者就有约52人。南学会藏书处不但藏书丰富,还制定了《南学会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管理较为完备,促进了新学的传播^[40]。

经过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的极力倡议,“开大书藏”“建藏书楼”的思想一时风靡全国,各地公立藏书楼、图书馆也随之勃兴。正因如此,康、李、梁三人常被视为推动中国新式藏书思想形成的关键人物,万木草堂书藏与强学会书藏也被看作是近代新式图书馆的雏形。而细考三人新式藏书思想之渊源则可发现,他们兼受中西方藏书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书藏的影响十分直接。可以说,书藏在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发生和新式藏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而论,若将阮元创办焦山、灵隐书藏;梁鼎芬仿效其建丰湖书藏;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提倡“开大书藏”“设藏书楼”,并建立万木草堂书藏、强学会书藏等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就可揭示出江南书藏制度与文化对广东的影响,以及书藏在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藏书制度与文化从北向南传播、从古代向近代演变的历程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内在理路。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外因已有深刻论述,对于内因却较为忽视。如吴晞也着重强调了李端棻、梁启超二人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巨大贡献,他甚至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等“上层统



治者的言论和观念”视为“新型图书馆思想终于在中国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1](42)},将梁启超奉为“新式图书馆思想的主要旗手和奠基人”^{[1](43-51)},并以万木草堂书藏、强学会书藏为例进行说明,却忽略了李、梁二人对清代书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以及近代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相似的是,李雪芬在论证梁启超新式图书馆思想时,也肯定了书藏的历史地位,却忽视了书藏的历史渊源,认为:“‘书藏’一词非康有为、梁启超独创,但是以‘书藏’命名,显然是为了与传统藏书楼有所区别”^[41],可事实恰恰相反,“书藏”这一命名体现出的正是梁启超新式藏书思想与传统藏书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此外,部分学者还试图从时间、性质两个方面论证近代新式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全无关联,其观点似乎还有可商榷的余地。就时间而论,《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藏书楼》等著作认为教会图书馆在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过程中起到了“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并以1847年所建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849年所建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1871年所建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1894年所建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等作为例证。这些著作极具慧眼,对教会图书馆的论述颇为深刻,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灵隐、焦山书藏分别建于1834年、1838年,在时间上早于以上教会图书馆;丰湖书藏建于1885年,早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遗憾的是,它们的重要性却未被充分认识。就性质与特征而论,吴晞等认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与中国传统藏书楼无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藏书楼缺乏开放性,如《从藏书楼到图书馆》认为:“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会开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1](2)};《中国藏书楼》认为:“近代图书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实际上是由基督教图书馆最初实现的”“这些基督教图书馆大多具备了开放型的特点,与传统的旧式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1823)},此类观点似将传统藏书楼的特点概括得过于片面,而忽略了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如上文所言,无论是灵隐书藏、焦山书藏、丰湖书藏,还是万木草堂书藏、强学会书藏,都有开放性的特征,而且其开放性一直在不断增强,甚至已经具备了公共藏书楼的雏形,由此才会引起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人重视,进而得以与西方

文化相结合,共同推动中国藏书史的近代转向。

因此,在强调西方影响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藏书制度与文化自明清以来就一直蕴含着内在变革的因素与自我演进的理路。

参考文献

- 1 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 2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3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 4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5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6 苏全有,李燕南.近年来对我国晚清图书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5):9-16.
- 7 曹溶.流通古书约[G]//祁承燦等.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
- 8 王蕾.论儒藏思想的发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1):97-103.
- 9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340-341.
- 10 章学诚.《藉书园书目》叙[G]//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92.
- 11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M].北京:三联书店,2017:328.
- 12 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G]//《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肇经室三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67.
- 13 阮元.虞山张氏诒经堂记[G]//《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肇经室续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65.
- 14 方浚颐.赠芥公退院序[G]//《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二知轩文存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4.
- 15 潘衍桐.两浙轩輗续录[M].夏勇,熊湘,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168.
- 16 叶廷琯.鸥波渔话卷五 25A[M].清同治九年刻本.
- 17 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二编)[M].民国七年影印本.
- 18 汪辰.焦山书藏目录后跋[G]//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541.
- 19 阮元.焦山书藏记[G]//《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肇经室三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68.
- 20 李富孙.杭州灵隐书藏纪事阮中丞夫子有记[G]//校经阁文稿卷四 7A—7B.清道光刻本.
- 21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G]//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62.
- 22 王豫.淮海英灵续集庚集卷五 18B[M].清道光刻本.
- 23 潘衍桐.缉雅堂诗话[G]//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广州大典:第51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161.
- 24 陈任畴.焦山六上人诗·序[G]//《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编委会.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第14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2016:344.
- 25 丁敬涵.马一浮先生年谱简编[G]//吴光:马一浮全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9.
- 26 要闻·焦山书藏委员会开会[N].申报:1929-9-10.
- 27 刘彬华.岭南群雅[M].清嘉庆十八年玉壶山房刻本.
- 28 焦山书藏委员会.焦山书藏书目[G]//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29 陈文述.安亭书藏记[G]//颐道堂集·文钞卷十一 17A.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 30 袁昶.尊经阁记[G]//祁承燾等.藏书记[M].扬州:广陵书社,2010:122.
- 31 谭宗浚.菊坡精舍书藏铭[G]//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希古堂文甲集卷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192.
- 32 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401.
- 33 梁鼎芬.丰湖书藏四约[G]//陈建华,曹淳亮.广东大典:第337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747.
- 34 梁鼎芬.检理焦山书藏乞事口占二首示庵主佛如[G]//节庵先生遗诗卷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2.
- 35 朱希祖.《广东通志总目》说明书[J].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3):28.
- 36 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G]//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337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751-755.
- 37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2.
- 38 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一礼政六[M].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 3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64-165.
- 40 谢欢.清末湖南南学会藏书考[J].图书馆论坛,2017(2):92-96.
- 41 李雪芬.强学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图书馆学刊,2017(8):90-92,9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8日

修回日期:2021年1月19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 Inner Logic of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a's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Taking Shu-cang as a Clue

Liu Chi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promotion of Cao Xuequan, Gu Yanwu, Zhu Yun, Cao Rong, and Zhou Yongnian, the concept of book collection in China began to shift from official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to public collections.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collections, Ruan Yuan established two Shu-cangs in Lingyin and Dinghui temples separately, which had tendency of public libraries. These two Shu-cangs heralded the actual transformation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into public collections. And then, the Shu-cang had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monasteries to academia, as well as introduced to Guangdong from Jiangnan by Fang Junyi and Liang Dingfen, completing the geographical spread from north to south. Until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ang Youwei, Li Duanfen,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all took Kaida Shu-cang 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which had formed the reform steps of building Shu-cang by donation, prospering institution by Shu-cang, promoting reformation by institution. The reform movement had made Shu-cang swept through the country as well as engaged with western culture, which gave birth to a new type of modern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Shu-cang system and culture had been leading the trend of internal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llections. If we tak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hu-cang as a clue, we can clearly outline the inner logic for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a's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Keywords: Shu-cang; China's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Modern Transition; Inner Logic